

■ 学者导读

2008~202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联合进行的玉架山遗址考古，揭示了六个环壕构成的良渚文化早中晚时期的完整聚落群，曾入选“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玉架山遗址所在的这一区域，属于超山、半山、临平山所在的“临平遗址群”。史前考古工作主要始于1993年临平横山两座良渚文化晚期高等级大墓的发现，之后是三亩里、后头山等遗址陆续发掘，随后是归属于玉架山环壕聚落的万陈村、灯笼山遗址的考古。差不多与玉架山发掘的同时，因为建设开发，距离其南部仅千余米的茅山遗址得以大规模揭露，首次发现了良渚至广富林文化时期的大规模古稻田生产区和生活聚落。

临平遗址群位于良渚文化中心，良渚古城所在的良渚遗址群东部20余公里处，它们彼此之间关系如何？玉架山遗址显然是自始至终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良渚遗址群崛起的讨论近年来取得了重要成果。《瑶山》报告出版后，非常明确地提出，在良渚文化最早期，瑶山祭坛和墓葬复合遗址就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埋设M9等大墓，崧泽文化遗风的圆和弧边三角组合图案的随葬陶豆，构建起良渚遗址群崧泽文化晚期向良渚文化早期发展的桥梁。随着良渚遗址群南部大雄山石马兜、官井头、北村等良渚文化早期重要遗址的发现，“早期良渚”的面貌逐渐明显。这些良渚文化早期遗址从距今5300年左右开始聚集，在后来良渚古城所在的箬箕形盆地四周，开启了良渚文明的发展，瑶山就是这一时期的中心，以琮、钺和复杂玉头饰等成组玉礼器的用玉制度形成。

玉架山差不多也是同步发展。玉器是良渚文明最鲜明的物质和精神标识，玉架山遗址出土的成组玉器是比较研究良渚玉礼制文明的重要材料。

玉架山M200、M149均属于良渚文化早期墓葬。M200出土的成组玉器是目前唯一可以堪比稍早时期瑶山M9、反山M22的高等级女性权贵大墓，其玉器种类齐全，玉料品质俱佳，工艺也甚为精湛，其中倒梯形神鸟钺孔刻纹冠饰器的图纹，与反山M12豪华权杖玉钺上的一周纹样结构完全一致；圆琮刻纹虽然线条略显呆板，大眼内的小尖喙刻划还明显不符合瑶山同类刻纹的范式，但基本形态一致；位于头端部位的圆形镶嵌件，极有可能与反山M22圆形器镶嵌玉件同形制。玉架山M200东南侧M149，也是一座随葬冠饰器、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琮的大墓，成组锥形器一组7件，在瑶山、反山王陵中，这样的配置属于男性权贵的第二等级。玉架山这两座墓葬是环壕Ⅰ中部墓群良渚文化早期等级最高的一组，是这一墓群的核心成员。另外，玉架山M200和其他墓葬还出土了陶过滤器，这类特殊陶器是良渚遗址群良渚文化早期的标识性器物，有非常明确的地域分布范围，还往往与标识女性性別的璜、纺轮共出。

玉架山M194还出土一件玉冠形饰件，其图纹见于凌家滩97M15三件玉冠饰，见于瑶山M12收缴的2789号玉琮神兽眼梁部位，还见于瑶山M4、M11和官井头M51、M54等璜的凹缺部位；安徽潜山薛家岗、武穴鼓山的半圆弧状钺孔玉饰也是同样的形制。2024年，千里之外的内蒙古敖汉旗下洼镇红山文化元宝山积石冢遗址M15也出土了同类器。说明这一时期玉架山玉冠形饰的这类图纹具有特定的含义，其祖型似可追溯到河姆渡文化时期的双鸟形器（蝶形器）。如此大范围内分布，但最后又集中到“良渚”身上，是集大成者的体现。加上玉架山蹲踞玉人、玉龙、神眼纹玉器等良渚文化早期代表性重要玉器和图纹，充分说明玉架山遗址在“早期良渚”中的地位。

临平遗址群的玉架山、茅山是两处发掘揭露面积最大的遗址。茅山古稻田的生产区大大超过生活区的需求，严文明先生《良渚颂》评价莫角山大粮仓：“巨量粮食何处产？原来郊外有茅山。茅山稻田数十亩，不啻王室大农场。”经过对玉架山环壕周边约15万平方米区域的大范围考古勘探，没有发现耕种的迹象，生产区或许在更远的地方。两处遗址毗邻，当时先民应该知晓茅山麓南部有大农场。玉架山环壕Ⅰ揭露较为完整，墓群分为北、中、南三个区域，彼此有相当大的空间分割，还发现了房址、“广场”等，虽然缺乏生活区必需的废弃堆积，但不能完全断定环壕Ⅰ就是作为墓地使用，不排除仍是居址合一的生活聚落。

环壕作为聚落形式早在上山文化就已经开始了，为什么在之后发展过程中发现的不多？应该有多方面原因，发掘面积不够大是其中之一；另外，从上山、跨湖桥到河姆渡文化，以及从低矮丘陵地带向沼泽平原发展的马家浜、崧泽文化时期，平原地区利用天然的河网和沼泽湿地形成聚落之间的阻隔是一种新形势。我们很难理解玉架山贯穿良渚文化的六个环壕，如果作为特殊的墓地能够存在那么多年，实在太匪夷所思。唯一的解释就是遗址密集的分布区域内，我们对于总体的把握往往因为发掘面积有限和系统勘探没有跟上，还不知那些遗址和遗址之间的空间关系是如何界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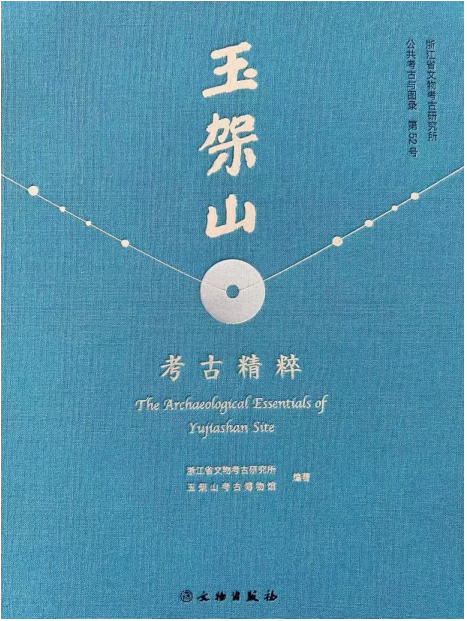
玉架山所在的临平遗址群对于良渚遗址群举足轻重，良渚文化晚期的德清中初鸣制玉作坊遗址群位于它们中间偏北。该区域近10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密集分布了众多以蛇纹石材料为主，专门以制作锥形器、管珠等“低端玉器”为主的制玉作坊遗址。它们不可能与早已伫立的良渚古城没有任何关系，良渚文化晚期核心区域周边出现的新的生产和经济模式势必也会影响同时期聚落社会的格局，这在审视玉架山遗址时需要考虑。

从1936年施昕更试掘良渚，对于良渚的认识不断与时俱进。从良渚遗址群的提出，良渚古城的确认和庞大水利系统的发现，瑶山为代表的早期良渚的探索，空间格局认识不断扩大，成为研究良渚文明化进程的重要内容。把良渚遗址群放在包括杭州古荡在内的良渚遗址群“C”形盆大地的大视野，现在看起来还不够宏观，本所科技考古室工作人员已经把特别资源获取研究的触角伸向了浙西北的天目山余脉，那里蕴藏着玉，钱塘江流域桐庐富春江、分水江有着丰富的石材资源，富春江南岸的富阳瓦窑里遗址出土了良渚遗址群早期的重要标识性陶器过滤器。至于良渚遗址群与苏南、沪嘉地区高等级良渚文化遗址群之间的关系，相信随着聚落考古的深入，玉礼制研究的系统化会进一步明晰。2025年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重大项目的结项之年，除了多角度、全方位研究长江下游从距今5700年至4000年间的社会形态、技术发展水平、生产模式、宗教信仰等，如何以良渚古城为核心，全面展示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仍是初设的目标。

玉架山遗址考古前后历时逾十年，建设完成了考古遗址公园和玉架山考古博物馆，专题展示玉架山、茅山、横山等临平遗址群的考古成果。这是浙江省内第一家直接以“考古”冠名的博物馆，严文明先生专门为此题写了馆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岭老师负责策展，展览获评“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玉架山遗址资料整理还在进行中，考古报告的出版还需要一段时间，虽然图录不能替代考古报告，但为了能让公众充分了解玉架山遗址考古成果，先行编辑出版《玉架山考古精粹》，既是玉架山考古博物馆玉架山部分的导读，也可以引发对于玉架山遗址考古成果的新认识、新思考。

（原文有删减 作者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玉架山考古精粹》
编著：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玉架山考古博物馆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5月



构建中国自主考古学知识体系的有益尝试

——余西云《考古学十讲》新教材读后感

高蒙河

余西云教授几十年来扎根田野考古，深耕理论、方法与教学。他耗费多年心力完成的《考古学十讲》，终于2025年末付梓出版。此书向我们呈现了一部尝试构建中国自主考古学知识体系的概论性教材。通读全书不难发现，这是一部立足本土实践、兼容中西、守正创新的考古学概论教材。全书十讲，墨香扑面而来：

第一讲，立足全球视野，厘清学科本源。主要回答“什么是考古学”“考古学与古物学之间的差别是什么”等问题。对比中西考古学诞生脉络，辨析考古学与古物学、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关系及差异，梳理了19世纪现代奠基考古学的三期说、地层学、类型学核心方法，以联系的观点、实证的方法、系统性证据，确定遗存时空脉络的体系，形成堆积系统、遗存系统，搭建时空框架，把零散古物研究发展为现代考古学，搭建起人文与实践科学沟通的桥梁。

第二讲，围绕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展开。内容涵盖三个层次：其一，考古学以实物遗存为研究对象，最终目标是重建人类文化及其历史。书中认为，遗存的主要存在形式为遗址，遗址由各类遗迹或地层构成。遗迹由各类遗物构成，是各类遗物的集合体。其二，考古遗存的重要属性是“情境”，即遗存纵向时间与横向空间两方面的联系，书中将此作为讨论聚落与社会的基础和前提，认为没有情境思维，就难以深入理解聚落形态和社会组织，成为新书的一个“书眼”。其三，文化和考古学文化既是考古学研究的目标与对象，也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中国考古学长期坚持的传统。国外考古学往往聚焦于“区域”分析，放弃了“文化”概念，而新书着重讨论了文化研究、文化与族群认同、文化与历史重建的关系等。美国学者常将这类研究片面地贴上“文化历史主义”的标签，而这恰恰是中国考古学应该坚持的一个特色。

第三讲，聚焦田野考古。依托中国田野发掘实践，以六个案例梳理国内田野发掘理念的演变。早期以探方发掘为主，侧重剖面划线、厘清地层叠压打破的早晚关系，如今转向开放式发掘，重点辨识遗迹的形态结构、功能用途，兼顾遗存早晚时序与共时并存关系，以及与其他遗迹的联系，判断遗迹组、聚落面等，以揭示聚落的生产组织与社会情态。这套源自中国本土实践的发掘理念，在同类教材中鲜有提及，极具参考价值。

第四讲，资料整理。系统区分类型学、形制学、分类学三类分类手段，并提醒读者三种方法各有侧重，各有所长，均能解决关键学术问题，不可偏废。

第五讲，报告编写。针对以往考古报告编写惯例，提出两点新识：在层位或地层章节，应该



增设堆积序列分析，对遗址遗存的类别、性质做系统解读；遗迹部分，应该补充单个遗迹、遗迹组、聚落面的完整记述。过去多数考古报告对此着墨甚少，而这种调整，正是聚落考古、深度阐释阶段的必然要求。

第六讲，年代方法。主要谈基于堆积系统、遗存系统、文化序列构建起来的考古学时空框架、时空体系。提出相对年代方法与绝对年代方法并不是学科发展的两个阶段，而是互补共生的一个整体的两个侧面。在测年方法大量应用的今天，新书针对唯“碳十四”论以及用测年数据取代地层学、类型学的误区进行了辨析，认为绝对年代方法并不能取代相对年代方法。梳理堆积系统与遗存系统仍是一项需要持续完善、不断修正的长期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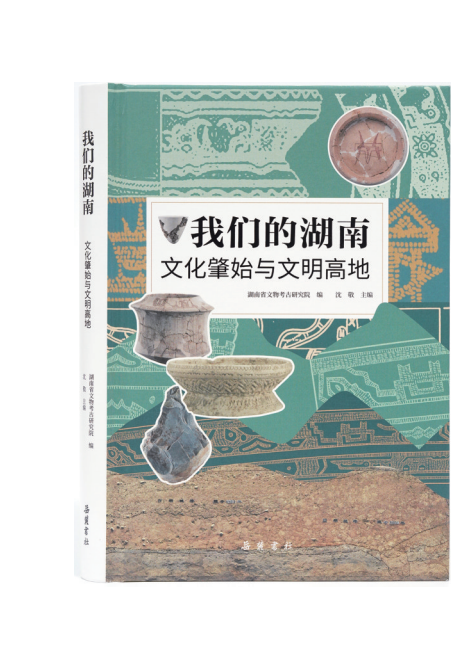
第七讲，空间方法。强调考古学研究需要揭示时间联系、空间联系，建构时空框架是考古学阐释的基础。而今有些考古学研究，缺乏时空框架基石，食洋不化地奢谈所谓理论方法和前沿课题，实不取足。

第八讲，聚焦古代社会复原。依据文化的三个层面——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总结国内现有研究成果，详细梳理宗教、家族组织等方面的考古研究成果。书中对政治组织的研究探讨相对简略，这也是当前国内社会复原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仍有拓展空间。总体来看，国内学界并不缺少社会阐释类研究，但其广度和深度仍可进一步提升。

第九讲，历史重建。主要讨论了文化区系、文化谱系、族群考古、文明探源和社会阶

在考古之光里，看见我们的湖南

沈敬 张兴国



讲述，有效拉近了专业与公众的距离；写法上，它将考古报告的专业术语转化为日常语言，把遗址的平面图演化为生动的场景还原，以讲故事的节奏承载学术思考，十余万字篇幅流畅易读，即便毫无考古基础，也能轻松踏入湖南史前世界；装帧则采用32开锁线圆脊精装，轻巧便携，让阅读随时发生。它以扎实的内容和友好的形态，成为走进湖南考古、了解湖南史前文明的形象书。

在建设文化强国、提升文化自信的时代语境下，考古科普承担着特殊的使命。要让文物活起来，首先需要让文物背后的故事活起来，让公众了解文物、理解文物、亲近文物。《我们的湖南》系列丛书的出版，正是湖南文物考古工作者践行这一理念的切实行动。它不仅是对于湖南考古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更是将小众的学术研究转化为大众的公共知识产品、将文化遗产转化为文化自信资源的有益探索。

回望湖南考古的历程，从1999年的《湖南考古漫步》，到2012年的《发现湖南》系列丛书，再到2021年的《考古湖南——十堂课听懂湖南历史》，直至今日的《我们的湖南》系列，湖南考古人的科普之路越走越宽，科普的意识越来越强。这背后，是考古学家从象牙塔走向公众的时代趋势，也是考古工作者文化自觉与社会责任感的体现。考古不是挖宝，不是猎奇，而是通过科学的方法重建人类的历史与行为。让公众理解这种方法逻辑、分享这种重建的成果，本就是考古学应有之义。

在2026年的这个盛夏时节，《我们的湖南：文化肇始与文明高地》作为系列开篇之作如期面世，后续三册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编撰之中。撰稿团队与考古专家紧密携手，满怀对这片土地的热忱，为所有关心湖南历史文化的读者合力捧出了这份凝结多年心血的考古硕果。愿这套丛书成为一叶轻舟，载着我们一同驶向湖南历史的深处，正是这种跨越时空的连接，构成了文明的底色，也构成了“我们”的来处。

（作者单位：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信息中心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我们的湖南：文化肇始与文明高地》
编著：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主编：沈敬
出版社：岳麓书社
出版时间：2026年6月